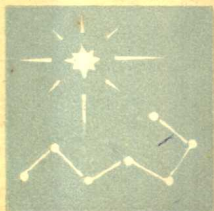


吳伯蕭



北極星



北 極 星

吳 伯 簫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裝幀、插圖：袁運甫

北 極 星

書号 164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

字數 6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6}$ 印張 $4 \frac{5}{18}$ 插頁 2

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40000 册 定價 (3) 0.38 元

北京东單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多写些散文

(代序)

作为精神食粮，散文是谷类；作为战斗武器，散文是步枪。我们生活里常用散文。在文艺园地里，散文也应当是万紫千红中繁茂的花枝。

我国散文是有优良传统的。最初的历史家和哲学家，差不多都同时是优秀的散文家。“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老子用两句话说明了一个辩证的道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丘明用十个字记叙了貌似强大的敌人的溃败过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里这段话简洁而生动地画出了一幅游春图。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争鸣的百家表达思想，记叙事物，有的用平易淡远的语录，有的用气势磅礴的辩论，有的用质朴动人、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都不同

程度地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他們的著作，一家一家汇成滿天星斗，长远地閃灼着燦烂的光輝。

汉朝司馬迁写《史記》，继承了先秦散文的优良傳統，記人，叙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賢賢賤不肖。”“成一家之言。”苏轍說司馬迁“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气。”魯迅也称《史記》为“史家之絕唱，无韵之《离騷》”。

唐宋两朝，继先秦、两汉，又有韓、柳、欧、苏等“八家”。韓愈提倡“文以載道”，反对堆砌辞藻、空洞无物的駢儷文，柳宗元写寓言諷刺文章和山水游記，都給后来的散文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不說。到了魯迅，散文直接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反对市僧买办的銳利的武器。

这种优良的散文傳統，我們应当继承，并且已經在继承着。如今从我們的报纸刊物上，經常可以讀到很多清新流丽的散文。《人民日报》发表的《圣人泉》，写左权將軍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在太行山黄烟洞附近挖掘山泉的故事。里边插叙了

“二郎担山赶太阳”的神话，也记叙了群众对山泉的各种传说。

朱总司令在这里饮过战马，刘伯承将军在这里洗过脸，游击队员们用泉水煮过野菜，鲁迅艺术学校的青年们来这里吟过革命的诗篇……

这些都富有情趣，给人很多启发和教育。又一篇《从边疆到边疆》，写了“北大荒”的茭瓜子在春城昆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经过。描写了哈尔滨的菜窖、暖棚和温室：窗外漫天飞雪，零下十七度，窗里却煦暖如春，满地长着又鲜又嫩的红辣椒、白豆荚、紫茄子。木耳和蘑菇也都在那里安了家。文章洋溢着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胜利。还有一篇七百多字的短文，题目小，叫《头绳》。联系《白毛女》里的喜儿过年和准备出嫁扎红头绳的事，写一根头绳给穷人家姑娘所能带来的安慰和喜悦。也很感动人。

这些短文写的都是新事物，接触到了我们欣欣向荣的生活里兴水利，种蔬菜，俭朴之为美德的课题。这里随手引来作例，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值得写的事物太多了。从壮丽的河山到无尽

的宝藏，从增产粮食到林、牧、副、渔，从工厂、矿山到长江大桥，……哪一方面都需要我们来热情地歌唱。至于勤劳勇敢的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就更值得我们千遍万遍地写文章颂扬了。

我们实在应当多写些散文。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目 录

多写些散文 (代序).....	1
齒輪和螺絲釘.....	1
北極星.....	9
延安.....	19
記一輛紡車.....	24
菜園小記.....	31
歌聲.....	37
窑洞風景.....	44
記列寧博物館.....	51
懷劍三.....	59
天安門廣場.....	64
火車, 前进!.....	71

难老泉.....	80
崆峒山.....	89
猎户.....	103
春秋多佳日.....	113
說讀报.....	117
从实际出发.....	122
一种《杂字》.....	129
写作杂談.....	136
跋.....	144

齒輪和螺絲釘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宁回到了俄国。这时列宁避开沙皇宪兵暗探耳目，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上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維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論文，成了党在日常工作中的指令。

这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里的一段話。

这段話里所說的列宁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論文里边就有《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那篇标志文学新紀元的論文。那是那年十一月十三日发表的。在那篇論文里列宁响亮地喊出了“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則。

那篇論文是无产階級文学工作的指南。列宁在那篇論文里摆好了文学在无产階級革命事业中的位置，确定了文学无比光荣的任务。他說：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階級总的事业的一部

分，成为一个統一的、偉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就是那篇論文給当时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開了广闊的繁荣的道路，也給世界进步的文学指出了明确的前进的方向。现代文学史說明，高尔基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就是在那篇論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即一九〇六年写成的。列宁給了《母亲》很高的評价，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曾当面对高尔基說：“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現在他們讀一讀《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列宁所以給《母亲》这样高的評价，就因为《母亲》的作者高尔基严正地保卫了布尔什維克的立場，正确地描写了革命无产者的形象，在作品里具体地体现了列宁在論文里所說的“公开的、誠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生动地反映了工人运动的现实的緣故。

党的文学是站在党的立場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文学。它体现生活的規律性，反映火热的阶级斗争，歌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和英雄事迹，并且为不朽的革命事业塑造典型，树立旗帜。它鼓舞正在战斗的人们，给他们欢乐，坚定他们必胜的信心。它描写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为事业的发展指出道路，绘出远景。像法捷耶夫有一次说的：“党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使命不仅是反映新的事物，而且是帮助新的事物取得胜利。”它同时给一切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事物，给一切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敌人以无情的揭露和打击。

文学的党性是跟文学的人民性结合得牢不可破的。照别林斯基的话说，文学是“人民的意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反映”。又说：“谁有才能，谁是真正的诗人——谁就不能不属于人民。”党的文学正是最能表达人民的意识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党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列宁在论文里说：“它将……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

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是“针对着资产阶级的习气，针对着资产阶级的营利的做生意的出版业，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

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提出的。照列宁的意思，文学上一切个人主义的打算都应当彻底摒除。“文人无行”的腐朽观念，“文人相轻”的行帮思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孤高，“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炫耀，都是错误的。至于在文学事业上不肯艰苦劳动，不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而只想“闭门造车，自作聪明”，一觉醒来想凭一首诗成一个桂冠诗人，想靠一本书名利双收，那更是卑不足道的。

正无妨这样说，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家，离开党的教育，离开党的事业、人民事业的发展，那是没有方法写出优秀作品的。文学只应当也只能反映现实。它要写生活，写人。不但没有抗美援朝不可能有《三千里江山》，没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可能有《三里湾》，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若是没有俄罗斯人大败拿破仑，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固然“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要“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但是首先要有

的还是人民的生活啊。劳动人民創造一切，作品的第一手作者也是劳动人民。作家要熟悉生活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毛澤东同志所說“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道理在这里。作家要用文学作武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建設劳动，然后才能有像列宁所說的作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这部机器的“齒輪和螺絲釘”的文学事业，道理也最显明。

列宁在論文的开头說：“十月革命之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在日程上提出了关于党的文学的問題。”我們現在的中国是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到来的时候，党的文学的原則更是絲毫不能动搖的。只要想想，我們当代的作家，若不是按党性原則进行文学創作，不是把文学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写工业，写农业合作化，写水利，写开荒、造林、地质勘探，写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故事，写新事物的生长、旧事物的死亡，写今天和明天的辛勤劳动和幸福繁荣，那么还能写什么呢？难道能够允許写腐臭透頂的所謂“到处有生活，到处有斗争”的那样的“生活”和

“斗争”么？作家若不是按党性原则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用民族的勤劳、勇敢等优良传统来通过作品教育人，鼓舞人，使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更快，规模更大，难道能够允许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投机取巧，来使人腐化堕落，扭转时代的车轮往后退么？作家，若不是像一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跟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谐和一致的操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难道能够允许“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把个人爱好，低级趣味，用文字游戏任意散播，来松懈我们的工作、瓦解我们的组织么？

不。不能够允许。

列宁在论文里说：“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受监督的。”这是一针见血的话。事实是非这样做不可的。不可能想像，当纯洁的青年，智慧在发展，求知欲正旺盛，最需要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时候，当很多人因为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坏习惯妨碍他们前进，进行思想改造唯恐不及的时候，却让一些反党的报刊读物充斥市场，传播毒素，使青年人受沾

污，使老人物更保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蚊蝇要消灭，垃圾要扫除，反革命的讀物，黄色书刊，是应当像蚊蝇垃圾一样打扫干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把胡風反革命集团从根鏟除之后連它散放的恶浊空气也一定要加以澄清的緣故。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整个人类是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所掌握的社会发展的規律前进的。所有忠实地反映这个时代生活的作家，不管他是党员也好，不是党员也好，都要从党的原則出发来进行創作，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才能創作出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的正是党性。文学作品的好坏，党性是一个尺度。党的，就为人民所欢迎，所爱好；反党的，就为人民所憎恶，所抛棄。那是沒有迁就餘地的。

列宁写的論文《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发表了已經整整五十年了。苏联作家遵照列宁的指示，五十年来創造了燦烂的文学。現在我們重讀这篇論文，論文的精神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也是从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則出发，教育我們文学要为人民服

务，为工农兵服务。我国作家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同时也就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在文学事业上也出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景象。问题是党性感情并不是每个作家每个时候都毫无例外地那样纯粹、饱满、强烈的；相反，有的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党性原则，因而在写作上就犯了错误，发生了毛病，给读者留下了不良的影响。现在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造高潮到来了，这是比土地改革更加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是空前的，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作家在这样的時候，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在全盘机器上把齿轮和螺丝钉扭紧，齐一步调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

当我们动笔写作的时候，我们不妨随时自问：

“这是为党的么？”

“这样合乎党的要求，符合党的利益么？”

用作品作证，希望每次回答都是肯定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